Y T08/07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石家庄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6 印张　147,000字　印数：1—705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31　定价：0.60 元

目　　录

赵博生传略……王新友（1）
董振堂传略……韩增玉（50）

喜峰口抗击日寇的回忆……陈芳芝（126）
古北口抗战记实……孟恒昌（132）
怀柔抗战概况……魏明全（149）

“胜芳蔡”发家史……蔡慕韩（156）

我省最早的汽车路
——张库公路早期通车营运简况……省交通局（173）
有关张家口怡安公司的回忆……韩茂如（177）

赵博生传略

王新友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江西宁都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兵暴”事件——蒋介石派往赣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在总参谋长赵博生等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到达苏区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

当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东北大好河山，沦亡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策划对我中央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在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宁都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的罪恶阴谋，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壮大了红军力量，给革命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宁都起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赵博生同志的不朽功绩，也将永垂史册。

立志从戎

赵博生同志，河北省黄骅县（原新海）东磁庄人。一八九七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富裕中农家庭里。自幼秉赋聪颖，甚得祖父宠爱。七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取名恩溥。

在赵博生九岁那年，他家遭到一场横祸。一天夜间，本村地主赵以林家被土匪抢劫，丢失无数钱财，他嫁祸于赵博生家。诬

告赵博生的祖父赵逢春同劫案有关，赵以林有钱有势，串通官府。赵逢春自知争辩不赢，只好离家避难。县役则趁机勒索说："人不到案钱到案"。还扬言要带赵房长孙赵博生到县抵案，逼得全家典地当物，含泪逃往他乡。半年以后，此案虽告结案，但赵家的光景从此破落。可是赵以林还不肯罢休。在赵博生十五岁那年，其父赵以明在赵以林的田边割草，赵以林借口割了他家的庄稼，将赵以明打伤。赵博生大怒，要到官府控告，被祖父苦苦拦阻。博生恨恨地说："等我长大了，再算这笔帐！"

从此，官府的黑暗，地主的横暴，劳动人民的苦难，就深深地埋藏在赵博生幼年的心灵里。

一九一四年，十七岁的赵博生，念完十年私塾，辍学在家。这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军阀竞起，连年混战，农村凋蔽，日甚一日。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妄图乘势瓜分中国。赵博生看到家庭的屈辱，人民的苦难和疮痍满目的祖国，改造社会、救国救民之志，油然而生。可是他觉得没有知识，不能救国救民，于是到处想法去求学进修，均未如愿。正在失意之际，他的三叔赵以立提出，让他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赵博生感到这是一条出路：既可读书，又能习武。况且当今乱世，只有掌握枪杆子，才能拯民于水火，促进中华富强。因此，他稍作准备，便去保定军校投考。赵博生虽然经过十年寒窗，但学的都是"四书"、"五经"，与考试课目不同，结果只能作个旁听生。赵博生对此并不介意，只要有书读就行，况且学的又是自己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新鲜知识。所以，赵博生一踏进校门，就如饥似渴地学起来。学校规定晚上九点熄灯，赵博生买来把香，熄灯后他躺在被窝里，在同学们的鼾声中，借着把香的微光，每每读到深夜。他在日记中写道："抱救国之志，负救国之责，不得不努力求学。人若无丰富知识，虽欲救国，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欲达此目的，非努力求学，则不能成功。"经过短短半年的努力，他就以优异成绩升入正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班，接着跃入优等生行列。又两年，他越级、跳班，在全校名列前茅，成长为一个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少壮军人。

一九一七年，二十岁的赵博生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特优”成绩，由第七期提前作为第六期毕业，派往北京北苑参加第一师步兵三团二连当见习军官。他欣喜自勉，终于资志以偿。

追求新路

刚步出校门的赵博生，初出茅庐，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大展宏图，为国家为人民干一番事业。可是，严酷的现实总是打击着他的理想。当时，直系、皖系、奉系三派军阀，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挑拨下，争权夺利，互相兼并，战争连年不断。赵博生入伍后，先是在皖系军阀的北苑参加第一师；不久转入直系，任无线电教师；一场混战下来，他又落在奉系军中。三易军籍，还是跳不出军阀混战的火坑。于是，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怀疑起来。他看到，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阀对外不能御侮，对内不能拯民于水火，而他自己不过是在为军阀们当杀人工具和“炮灰”，根本无法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这时，他感到出路渺茫，从戎救国的大志开始冷下来。忧愤和苦闷使他悲叹：“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从军不能救国救民，倒不如去拉洋车谋生！”

一九二三年冬季，赵博生又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中。

冯玉祥本人出身贫寒，体恤下情，他的部队军纪比较严肃，官兵一律佩戴写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胸章和臂章。规定了所谓“每日朝会问答十条”——每天早晨照例有这样的问答：“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同志们辛苦了！”“为革命服务！”等等。针对旧军队中体罚士兵的恶习，还立下了“八不打”的戒条。这些虽然多半是一些口号，

不能兑现，更不会改变其旧军队的本质，但是对于追求正义的赵博生来说，却使他耳目一新，勾起了他的志趣和救国救民的思想。他从这个部队身上，隐约地看到了一线希望。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南方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消息传来，赵博生非常兴奋，他表示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积极主张参加革命。这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孙中山计划北上；共产党主张联合西北军，打倒曹锟、吴佩孚；在这种形势下，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部，发动了“北京政变”，一举推倒了曹锟的贿选政权。推举段琪瑞为“临时执政”。这些，使赵博生欢欣鼓舞，他以为这就是革新的前景了。一九二五年，他担任第五旅参谋长时，常对部下作讲演，他比喻说：“中国好比将要倒塌的一座大楼，人们住在里面将有死亡的危险。这大楼必须落地重修，才能坚固安全。‘重修大楼’——这是吾辈军人的天职。”而“北京政变”给他产生了一种幻想：他朦胧地感觉到，似乎“重修大楼”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但是这种幻想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一九二五年底到一九二六年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挑动下，西北军被北方各派军阀联合击败，冯玉祥被迫下野，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赴苏联考察。当时，由于作战勇敢，多谋善断，再加上作风正派，爱护部下，不贪财物，赵博生在西北军中，已经赢得了新秀可嘉的名声，他的职位也逐级提高。在冯玉祥下野前，他已被擢升为军参谋长了。

冯玉祥出走以后，战争仍在进行，赵博生率部在南口作战。当南口战事吃紧之际，他的堂弟赵恩荣从张家口给他写信，让他准备好便衣，以便战败时隐蔽。几天后，赵博生来到张家口，严肃地对恩荣说：“你写的什么信？太丢人了！——要枪杆子别怕

死，怕死别要枪杆子！”但是，仅仅少数人的英勇和奋战，根本不可能挽回整个西北军的颓势。冯玉祥留下的这支残败的部队，在南口战役失败后，又退回绥远、察哈尔一线，全军一片混乱。

赵博生随军退守包头。惨痛的事实使他猛醒：当前的战争，仍然是军阀之间的混战，自己在战场上冲杀，无非是为军阀的利益服务，为军阀做爪牙，即使战死沙场，于国于民又有何益？想到这里，他感到迷惘、痛苦与绝望。

启　　蒙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陪同下，由苏联回国。赵博生和部队在包头、五原一带迎接。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冯玉祥联合国民军第二军、第三军，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他自己出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召集全军将士在五原誓师，发表了著名的《五原誓师宣言》，正式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响应北伐。在国民军内部革除愚兵政策，废除体罚，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聘请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

五原誓师以后，党的北方局、南方局、上海局先后向西北军输送来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其中有陈延年、刘志丹、宣侠父、安子文、方仲如等同志，他们分别担任军、师一级政治部主任，加强了政治机构。以刘伯坚为首的共产党人，开展了对这支旧军队的改造工作，从而奠定了党对西北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基础。当时，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在五原开办干部训练班，营以上军官每天到总政治部听课。刘伯坚同志负责教政治，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和十月革命史；苏联顾问介绍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和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这种训练时间虽然不长，却使赵博生结识了共产党人，初步接触了党的纲领和政策，

使他受到了一次难得的启蒙教育。刘伯坚同志学识渊博，口才流利，经常深入下层，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他那深入浅出、内容丰富、鼓动性很强的讲话，使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常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当时，部队筹饷困难，有时数月不发饷。在西北军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听刘伯坚演一次讲，抵得发给三个月饷。"刘伯坚同志坚定的革命立场，乐观的革命精神和非凡的组织才能，不仅赢得了下层官兵的拥护，而且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许多上层军官中，也树立了极高的威信。

刘伯坚等共产党人，还在部队的先进分子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公开印行马列主义小册子和政治课本，创办小报，发表纪念十月革命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文章，教唱"国际歌"……，这一切，都在影响着赵博生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

赵博生惊奇地看到：在短短的时间里，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支几经重创、濒于瓦解的西北军，又恢复了元气，军心士气比以前更加旺盛，到处生机勃勃。赵博生尤其精神焕发，他敬佩这些共产党人，他感到和这样的弟兄们在一起革命，顺心、有劲，前途光明。

国民军五原誓师后，响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行动，接受李大钊同志的建议，提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除留部分部队阻击由京包路西进的奉军外，其余大部进入陕甘地区。在甘肃境内，西北军有几个师被马鸿逵匪军阻截，不得前进。赵博生看到有些军官胆小怯战，非常气愤。他召集所属师、旅、团长开会说："咱们这么多军队，却被一小股土匪挡住了去路，真是丢人！下次进攻，由我带手枪旅打冲锋，不歼灭这股匪军，决不收兵！"战斗打响后，赵博生身先士卒，亲率手枪旅勇猛冲杀，使敌人乱了阵脚，首尾失顾，后续部队趁机掩杀，击溃了马匪。随后，队伍一路疾进，直捣陕、豫。赵博生此时任三十一军参谋

长，率部转战河南，先后击败许昌、郑州、新乡等地的守敌，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夏历八月四日，赵博生同志曾在新乡拍照留念，志其克敌制胜的豪情。

与此同时，北伐军也以摧枯拉朽之势，挥师北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湘、鄂战场，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十月攻下武汉，军阀吴佩孚崩溃；在赣、闽战场，北伐军先后攻下了南昌和福州，击溃了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在浙、皖、苏战场，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先后占领了杭州、南京、上海，消灭了军阀孙传芳的全部势力；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部为北伐军所有。北伐军几乎占有半个中国。面对革命的大好形势，赵博生异常兴奋，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独夫民贼蒋介石竟然在此时刻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顿时，腥风血雨铺地而来，北伐的胜利果实被断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反革命的屠刀扼杀在血泊里。

此时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又如何表现呢？正如，冯玉祥本人在“五原誓师宣言”中对自己的剖析：“我虽然作了点革命事业，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以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点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所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象革命，其原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冯玉祥发表这个宣言以后，他的言行依然如此。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在徐州马上举行了秘密会议，随后在西北军中和他管辖的地区内进行“清党”，把共产党员全部清洗出来，打着“礼送”的旗号，用专车押送武汉。

从此以后，西北军中的革命气氛遽然消散。社会科学的讲演停止了，共产党人的书报停刊了，赵博生所崇敬的大批共产党人被清洗了，有的被迫入狱，有的黑夜失踪。他感到痛苦、茫然，痛

恨蒋介石，不满冯玉祥。他又一次陷入迷惘、痛苦与绝望之中。

不爱钱的将军

大革命失败以后，军阀继续混战，加之西北连年大旱，反动政府横征暴敛，人民生活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在西北军任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的赵博生，对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恨。他曾撰写《救国救民之责任》一文，申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表示决心拯救人民出苦难。此时，赵博生对国民党已经失望，但出路何在呢？他还是不明确的，他的心情处于犹豫、徘徊和苦闷之中。他感到自己眼前所能做的，就是刻苦自勉，随时准备为国为民献出自己的五尺之躯。他对官兵们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坚决地为劳苦大众奋斗一天。"同时，当年共产党人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使赵博生受到启发，他开始注意部队的政治鼓动工作。他亲自作了一支《革命精神之歌》，教育和激励部属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歌词是：

"先锋！先锋！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犹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实现大同。”

赵博生将这首歌在特种兵教导大队中广为教唱。这是他的心声，也是他的抱负。不过，这时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超出三民主义的范畴。

赵博生同志刻苦自勉的精神，还表现在他的生活作风上。他出身劳动阶层，地主豪绅横行乡里，劳动人民告苦无门的情景，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虽然他长期生活在旧军队，做了官，当了将军，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拯民于水火的初衷，仍然保持着比较俭朴的生活作风。他戒烟戒酒，不贪财色。他的妻子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来的，个子矮小，相貌不扬，又不生育。但他根本没有弃妻负义之意。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妻丑而无学，不再纳娶。”仅从其弟赵恩鸿那里过继来一个女儿。这在当时堪称难能可贵。他驻守西安时，身兼三职，月薪达四百余元，但他除了伙食开支，花钱买书和支援朋友外，不事积蓄。因此，在西北军中，赵博生以“不爱钱的将军”被广泛传颂。

在个人生活上，赵博生亦甚俭朴。他随军不带家属，其妻来队时，他就把破旧衣服找出来让其拆洗缝补，有些衣服太破，很难补，博生同志耐心解释说：“衣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应该珍惜，补补还是能穿的。”他常勉励其妻说：“千万不要学那些‘官太太’坐吃等穿的旧习气。一个人不劳动生产，吃的穿的从哪来呢？”其妻每次来队，住不多久，便被他动员回乡生产去了。

赵博生同志常穿着带补钉的衣服，在官兵中影响很好。有一次，特种兵旅教导大队的士兵们问他：“参谋长，你有条件穿呢子军服，为什么偏穿一些带补钉的军衣？”赵博生笑着回答说：“我也喜欢穿呢子军衣，将来国富民强了，我一定要穿。可是现在不能穿。你们看看有多少老百姓连我们这样的破衣服还穿不上啊！”

西安举义旗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军阀大混战，赵博生奉命留守西安。一场混战下来，冯玉祥大败，被迫再度通电下野。西北军被打得七零八落。这时候，蒋介石派来收编西北军的部队开到了咸阳以西，对西安守军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而防守西安的十四军孤军无援，摆在十四军官兵面前的两条路，或者是接受蒋介石的收编，实际上是缴械投降；或者是兵戎相见，但众寡悬殊，决难取胜。上层军官经过多次研究，最后军长陈毓耀决定投降、受编。赵博生心中却另有打算。平时，他就非常注意在他所领导的特种兵旅教导大队的官兵中灌输进步思想，此时，这个大队已具有初步的革命觉悟和爱国热情。教导大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质量好，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毕业后都是担任排长或连长的。赵博生想以教导大队为骨干，把队伍拉出去，摆脱军阀的控制，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发展壮大，就可以建立起一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为救国救民而战斗的爱国军队。他召集教导大队等单位的官兵号召说："我们不能交枪投降，投降不过是由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的手中，继续为他们卖命。参加军阀混战，打来打去，祸国殃民，这是违背吾辈革命军人的良心的。大家如果相信我赵博生，我愿意带领大家离开西安，另谋一条革命的道路。"赵博生的号召，立刻得到了全队官兵的积极响应和一致赞同。大家推选赵博生为司令，孙毅为参谋长，成立"三民主义救国军"，下辖三个支队，共约三千人，在一个秋夜，以演习为名，把队伍带出城外，准备南下汉中，开辟革命的新路。

这是赵博生第一次独立领导一支队伍。他率领队伍向鄠县进发。在鄠县住了一个晚上，找到鄠县县长，让他帮助筹款，县长送来了一些款子，还搞来一些毯子、口杯等日用品。第二天，部

队经崂峪口继续向东江口挺进。

突然，响起一排枪声，前头有人倒下了。赵博生急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组织回击。经过侦察，才知道这是一股土匪，企图拦路劫取这支武装。赵博生当机立断，选中敌人的一个弱点，指挥部队猛杀过去，冲开了一道前进的缺口。但走不多远，又遇上一群数量更多的乱兵，封锁了所有的隘口要冲，双方互攻一阵。赵博生不敢恋战，急忙率领部队向深山撤退。

原来，这一带土匪势力猖獗，各立番号，占山为王，既蹂躏百姓，又弱肉强食，互相火并。赵博生率领队伍恰好进入了这个土匪区，势孤力单，只好退守深山。由于供给无着，特别是军粮无法解决，每日以包谷、核桃为食，难为长久之计。其时，收编部队的参谋长是赵博生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闻知赵博生处境困难，便连续派人持函联系，劝说赵博生接受收编。赵博生出于无奈，表面依从了。实际上，赵博生和多数官兵，以分散形式，各奔前程，相约待机再举。

这次行动，是赵博生为摆脱军阀混战、另辟革命蹊径作出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它的失败，使赵博生认识到：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有待继续探索。

入　党

汉中受挫后，赵博生带着警卫员孙芳桂等几个随行人员，来到河南郑州，投奔其五叔赵以元。当时，赵以元在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部下任少将交际处长，赵博生想通过吉鸿昌和赵以元，谋求一条新路。

吉鸿昌将军和赵以元设宴为赵博生接风。席间，吉鸿昌将军询问了汉中受挫的情况，安慰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碰的钉子不比你少。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恩溥有勇

有谋，来日方长，不愁没有用武之地。"赵博生激动地说："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走革命这条路。你们帮助我到苏联去吧，我要在那里好好学习一阵子，回来再起兵讨贼！"

赵博生知道当时的苏联是支持中国革命的，他对列宁、斯大林开创和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十分向往的。他曾经对自己周围的亲人和朋友不只一次地说过："今天的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中国革命在苏联胜利的曙光照耀下，一定能够成功！"在追求革命多次受挫、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赵博生想仿效冯玉祥的先例，亲自到苏联走一趟，开阔眼界，长点见识，再回来重打锣鼓另开张。听了赵博生的话，赵以元沉思了半晌，然后说道："想法倒是不错，不过，这年头得讲实力政策，有人有枪才有说话的地方；要想干出一番事业，还是得抓枪杆子，要不然，光杆一人，没人买你的账。以我之见，你先在这里住下，看看形势，等待机会吧。"吉鸿昌将军也表示赞同赵以元的看法。赵博生觉得他们的意见也有道理，就答应先住上一段时间再说。

赵博生在郑州闲居的消息，很快让驻守山东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知道了，他立即派人到郑州来，聘请赵博生担任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襄理军务。孙连仲原先也是冯玉祥的部下，蒋、冯、阎中原大战后，一九三一年初，蒋介石往孙连仲的腰包里塞了几十万钞票，把他收买了过去，把孙连仲率领的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此时正在山东济宁改编。孙连仲聘用赵博生，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他久闻赵多谋善断，智勇兼备，尤其长于做参谋工作，是当时难得的人才；同时，孙连仲率领的西北军刚刚被蒋介石打败，正在接受改编，军心浮动，军纪涣散，局面很难支撑，赵博生是西北军的老人，在军中素有威信，把他请来当总参谋长，既可以帮助他收拾残局，重振军威，又可以借赵博生来笼络人心，巩固部队。

赵博生深知孙连仲的用心，但他又想利用这个机会掌握一支

人马，正符合他和五叔赵以元以及吉鸿昌将军原先的设想，在征求吉鸿昌将军的意见时，原来吉将军也正在考虑起用赵博生担任二十二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对吉鸿昌说："吉将军信用我，我十分感激。不过以晚生愚见，在一起干，倒不如另辟新路，将来视形势的发展，或合在一起，或互相呼应，力量要大得多。"吉鸿昌将军深以为然。于是赵博生接下孙连仲的聘书，走马上任。

二十六路军原有五万多人，被蒋介石收编之后，虽然装备不差，但是比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处处矮三分，士兵月饷只有蒋军嫡系部队的百分之七十。蒋介石为了削弱它的力量，改编的时候，只给它两个师的番号：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孙连仲只得将原先四个师的建制压缩为两个师，师长降级为旅长；蒋介石又让装甲列车、野榴弹炮和重迫击炮部队以及两个骑兵师脱离二十六路军的建制。二十六路军在早年的军阀混战中已吃过蒋军的亏，收编后又倍受歧视，官兵对蒋介石都憋着一股怨气。部队的这种情绪，与赵博生自然有共鸣之处。

一九三一年二、三月间，蒋介石便命令喘息未定的二十六路军立即开赴前线作战。部队由济宁开到浦口，接着又坐船经九江到南昌。等部队开到南昌，二十六路军的官兵们才看透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原来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蒋介石怕他们留在北方不好管辖，就在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的时候，将二十六路军等杂牌军调到江西打头阵，名为"讨赤"，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借刀杀人，让红军与二十六路军两败俱伤，达到其排除异己和消灭红军一箭双雕的目的。可是，这样以来，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对蒋介石的积怨就更加深了。

二十六路军开到了反共前线，赵博生的思想陷入深刻的矛盾中。他没有料到部队这么快地被调到前线，而且是要到苏区同红军作战。他知道，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苏区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现在要去进攻苏区，怎能把枪口对准红军呢？这

时，大革命时期那些共产党人的形象，那时候西北军在共产党人帮助下生机勃勃的军队生活以及令人鼓舞的战斗情景，又再现在他的眼前。几年来，他经常追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怀念刘伯坚主任以及许许多多朝夕相处的共产党人。经过几次挫折和失败，使他逐渐感到共产党人的方向是正确的。一九二九年，他在西安驻防的时候，曾经暗中派他的心腹朋友张志诚去找共产党联系。他对张志诚说："据我考察共产党在西北军中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真要革命的。共产党不光有坚定的信仰，而且里面有许多仁人志士，他们有学问，重信义，前途不可限量，我们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可能是一条生路。"他嘱咐张志诚一旦找到了共产党，就赶快同他联系。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时期，张志诚多次活动，始终没有联系上，赵博生只好搁下此事。但是，共产党人的形象，大革命的火炬，在他的心中始终没有熄灭。现在，当他奉命开来江西"剿共"，往昔的回忆在他的心中更加活跃起来。蒋介石、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他感到厌恶；"三民主义革命"看来没有希望。他是不愿意同红军作战的。但是身为军人，军令如山，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是同学，和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是同乡。这两个旅的许多官兵都是他的老部下，根据他在部队中的威信和号召力，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又将如何行动呢？汉中的失败，余痛犹存，他不能不记取，如果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不是仍将一事无成吗？经过一番思索，他毅然决定：再次找共产党去！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路军开到江西宜黄集结，准备参加蒋介石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就在这个时候，为了寻找共产党，赵博生找个理由，亲自去了一趟上海，然而费尽周折，也没有探出个头绪。后来他又派心腹李参谋外出寻找刘伯坚等，结果又是徒劳而归。

此时，二十六路军作为蒋介石"围剿"我中央根据地四路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